

第 四 次
全国人口科学讨论会
论 文 选 集

中 国 人 口 学 会

1986年2月

第 四 次
全国人口科学讨论会
论 文 选 集

中 国 人 口 学 会

1986年2月

编辑说明

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研究中心受中国人口学会的委托，组成编辑小组，编辑了《第四次全国人口科学讨论会论文选集》。

讨论会共收到论文110多篇，所反映的内容几乎涉及到了人口学的各个领域。限于篇幅，不能将所有论文全部辑入，只能选编一部分。选编的原则是：以选用与这次会议“城乡经济改革与人口问题，探索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计划生育道路”主题内容紧密相关的论文为主。凡在提交这次会议以前曾提交过其他讨论会或已公开发表的论文不再选用，会后发表的论文按其内容选用。

依据上述原则，我们在对所有文章进行选择 and 整理的基础上，共选编了54篇论文，予以全文或基本全文辑入。

“选集”大体分为七个部分，即领导讲话（5篇）、人口理论与人口政策（6篇）、计划生育（8篇）、经济改革中的就业人口与人口城镇化（13篇）、妇女人口与老年人口（7篇）、其它论文（25）篇。入选论文的排列，以每部分作者的姓氏笔划为序。入选论文绝大多数都作了一些文字上的删改和压缩，限于时间，未能经作者审阅，敬希见谅。

为了反映会议的全貌，我们将提交会议的全部论文编辑了题目索引，并辑入一篇“讨论会议综述”，作为本“选集”的附录。

限于时间和人力，“选集”难免缺点与不足，欢迎作者、读者批评指正。

《第四次全国人口科学讨论会论文选集》编辑组

一九八六年二月

目 录

在第四次全国人口科学讨论会上的讲话·····	国家计生委主任 王 伟 (1)
我国国民经济的发展与计划生育·····	许涤新 (6)
国际人口学会(佛罗伦萨)对我国1982年人口普查结果的评价和提出的问题 ·····	国家统计局 李成瑞 (10)
中国生育率迅速下降的理论解释·····	中国人民大学人口研究所 郭沧萍 (20)
当前必须严格控制人口增长——学习笔记(讨论稿) ·····	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研究中心 张乐群 (31)
试析我国人口的文化素质·····	同济医科大学 万有志 王世云 陈国林 (39)
具有深刻历史意义的转变——建国三十五年来人口发展回顾与展望 ·····	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研究中心 田雪原 (50)
中国人口与生态环境·····	北京军区计划生育办公室 张敏才 (59)
关于人口转变理论问题的初步研究·····	北京教育学院 胡伟略 (63)
我国人口问题及我国政策·····	中央党校 秦仁山 (72)
试论中国计划式的现代人口再生类典型 ·····	河南大学人口研究室 骆 奇 吴国民 (79)
必须抓好优生优育·····	中国人民解放军政治学院 刘瑞芳 (84)
试论“晚婚”、“间隔四年”对于控制人口出生数量的局限 ·····	暨南大学人口研究室 肖步才 (88)
从计划生育成就评价中国式的计划生育道路 ·····	北京经济学院人口经济研究所 杨清涛 (94) 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研究中心 杨子慧
试论计划生育改革·····	天津市计划生育委员会 张书统 (104)
计划生育的必然性及其相关规律性·····	湖南省委党校 周光复 (110)
从世界出生率的探索性数据分析谈我国的计划生育工作 ·····	复旦大学人口研究所 桂世祚 (118)
试论农村经济改革与计划生育·····	辽宁大学人口研究所 曹景椿 (129)
试论我国人口发展战略和中国式的计划生育道路 ·····	山西省社会科学院人口所 梁中堂 (137)
论我国人口城镇化的速度·····	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研究中心 王向明 (139)
农业新时期与人口再生产·····	陕西省社会科学院人口研究所 冯志异 (146)

试论我国农村经济体制改革与农村人口问题的关系	中国人民大学人口理论研究所 孙天爵 (150)
农业人口就地转移对城乡人口控制的影响	华东师范大学人口研究所 朱宝树 (156)
农村体制改革与人口城镇化	杭州大学人口研究所 刘长茂 (162)
经济改革中的市镇人口问题	北京经济学院人口经济研究所 李慕真 (168)
农村经济政策对人口发展趋势的影响	湖北省社会科学院人口研究室 李明开 (176)
经济开发与城市人口发展战略	南开大学人口研究所 李竞能 谢晋宇 (181)
二〇〇〇年中国劳动就业的预测和对策	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研究中心 李 辰 (188)
试论具有中国特色的城镇化道路	北京大学人口研究所 张纯元 (196)
我国农业人口向非农业人口转化速度的探讨	南京大学经济系 周启昌 杜闻贞 (205)
农民进镇务工经商与提高人口质量	山东省社会科学院 路 遇 (214)
从在业人口的状况看发展第三产业的广阔前景	河南省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 董式珪 (220)
递进人口发展模型的提出与总和递进指标体系的确立	中国人口情报资料中心 马瀛通 (225)
	北京信息控制研究所 王彦祖 杨书章 (225)
解放后我国人口寿命发展情况简析	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研究中心 王维志 (235)
人口流动现象统计研究的方法论问题	辽宁财经学院计统系 刘长新 (246)
我国妇女生育率地区差异的多元分析	上海市社会科学院 沈安安 (255)
论建立现代化人口管理信息系统	山东省工业干部管理学院 杨德清 (262)
社会学在人口系统定量分析研究中的作用	北京大学 袁 方 辜胜祖 蔡文眉 (268)
人口管理学的研究对象和方法	吉林大学 曹明国 (274)
哈尔滨市道外区城市人口死亡变动趋势 (1953—1983年) 的研究	董 情 杨建伯 付景善 (279)
论自发性人口迁移	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研究中心 马 侠 (287)
大西北的开发与移民	兰州大学人口研究所 刘天怡 (303)
育龄妇女人口死亡状况	西安医科大学卫生统计教研室 冯忠惠 赵 倩 (308)
我国社会发展与女性人口问题	西安交通大学人口研究所 朱楚珠 (315)
城市老年人口的归宿——关于北京市企事业单位退休职工居住形式的初步调查	全国总工会生活保险部 刘学章 (322)
中国社会养老的现状与趋势	河北省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 李澍卿 (329)
人口政策与老龄问题	上海市社会科学院 张开敏 (333)
上海市人口老龄化与计划生育	华东师大人口研究所 桂世勋 (340)
人口政策与山区开发初探	黑龙江省计划生育委员会 江 英 (348)

论西南人口的发展特征及战略设想

.....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 许改玲 (354)

中国少数民族人口的文化素质与现代化建设问题

.....北京经济学院 张天路 (362)

关于江苏省太仓等县1984年出现人口负增长的调查分析

.....江苏省计划生育委员会 余孟仁 (370)

宁夏人口增长的双因素分析及近期发展趋势估计

.....宁夏回族自治区社会科学院 常乃光 (374)

少数民族地区的经济与人口发展.....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研究中心 熊 郁 (380)

第四次全国人口科学讨论会议综述.....张 雷 (387)

第四次全国人口科学讨论会议论文题目..... (393)

国家计生委主任王伟同志 在第四次全国人口科学讨论会上的讲话

(一九八五年十一月十九日)

同志们：

这次第四次全国人口科学讨论会是一次重要的会议。这次讨论会是在中国共产党刚举行了全国代表会议之后召开的，这个时机很好。今年九月党的全国代表会议所确定的指导思想和方针政策，为我们进行人口科学研究和做好计划生育工作指明了方向。在党的全国代表会议上，邓小平同志提出要学习理论，这对于我们开好这次讨论会，并在这次讨论会以后，推动我们的人口理论研究工作，从而也推动我们的计划生育工作，必将起极为重要的作用。

自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在党中央马克思主义路线的指引下，进行了理论上的拨乱反正，人口学界解放思想，联系实际，开展研究工作，打破了长期沉闷的局面，机构一年比一年增加，队伍一年比一年扩大，课题一年比一年深入，形势一年比一年好。人口科学研究的发展，有力地推动了计划生育工作。

仅仅是几年的时间，研究工作就涉及到人口科学的许多方面，包括理论人口学、人口统计学和人口预测模型、人口社会学、人口经济学、人口地理学、人口生态学、医学人口学、人口思想史、民族人口学、农村人口与城市人口、人口心理学、人口教育学、人口素质等等。在各专题研究中都取得了不同程度的成果。这些研究成果对于我们的干部和人民认清我国人口的状况，人口问题在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中的地位，制定解决我国人口问题的战略、方针、政策，动员群众实行计划生育，起了不容忽视的作用。实际工作中许多工作原则与方法，如两种生产一起抓，算帐对比，区别对待，分类指导，“三为主”，以农村为重点等等，无一不是人口理论研究同计划生育工作实践相结合的产物。我相信，这次讨论会以后，人口科学研究进一步同计划生育工作实践相结合，会取得更加丰硕的成果。我国的人口科学将提高到一个新的水平。

这次讨论会确定的主题是：城乡经济改革与人口问题，探索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计划生育道路。这个题目抓得好，符合全党全国工作的总要求、总方针的精神。几年来，在党中央领导下，全国各族人民，各条战线，勇敢地、创造性地探索着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在这次党的全国代表会议上，中央把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作为总要求，把“争取基本奠定有中国特色的新型社会主义经济体制的基础”作为“七五”期间的一个奋斗目标向我们鲜明地提出来了。我们希望，全国的人口科学工作者和各级计划生育部门的实际工作者一道，围绕党中央提出的这个总要求和奋斗目标，更好地探索具有中国特色的计划生

育道路。

我们是社会主义国家，我国的计划生育道路必然是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下的道路，并在四项基本原则指导下，发展和丰富这条道路的内容。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从中央的一些文件和中央领导同志对人口问题和计划生育的论述中，从千百万人民群众的创造性实践中，包括人口科学工作者的劳动成果中，已经看到了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计划生育道路的一些显著之点。

第一，实行计划生育是我国的一项基本国策。这不仅表明我们党和国家对计划生育工作的重视，主要是反映了社会主义国家人的生产的规律。

我国是社会主义国家，要求物质生产有计划地进行，也要求人的生产有计划地进行。我们现在正在进行对物的生产和对人的生产进行调节这样一个伟大的系统工程。对人的生产的调节，是社会主义发展过程的需要。新中国成立三十多年中，在我国要不要控制人口，要不要实行计划生育的问题上，有过反复，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中央作了明确而肯定的回答。中央和中央领导同志有一系列文件、讲话阐述了我国控制人口、实行计划生育的必要性和紧迫性。党的十二大报告指出，“在我国经济和社会发展中，人口问题始终是极为重要的问题”。我国宪法规定“国家推行计划生育，使人口的增长同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相适应”。在国民经济发展计划中还包括对自然资源的开发和利用，对生态平衡的保护。因此人口的发展还应当同资源利用，同生态环境相协调。我们强调要同时抓好“两种生产”，就是基于对人口和经济相互关系的认识。“六五”期间，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取得了很大成就，人口的过快增长继续得到了控制。这是我国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体现。实践已经并将继续证明，我国在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同时实行计划生育，是能够解决面临的人口问题的。恩格斯在一百多年前就指出，只有在社会主义社会才能作到这一点。我们要坚持下去，把计划生育工作做好。

第二，我国计划生育工作以社会效益为唯一准则

人口问题联系着经济、社会发展的各个方面，计划生育工作联系着千家万户亿万人民，它关系我国社会主义四个现代化的进程，因此，必须把社会效益作为计划生育工作的唯一准则。党中央根据计划生育的实际情况，总结了历史经验，指出计划生育工作要有效地控制人口，又要密切党群关系，促进安定团结。这三句话、两个方面是对计划生育工作要取得好的社会效益的极好概括。小平同志说：“思想文化教育卫生部门，都要以社会效益为一切活动的唯一准则，它们所属的企业也要以社会效益为最高准则。”这个指示精神完全适合计划生育部门，我们要按照这个要求来衡量我们的工作，改进我们的工作。近一两年我们开始注意了用上述三句话来衡量计划生育工作的社会效益，但还没有自觉提高到“唯一准则”和“最高准则”的高度，今后要更自觉地认真抓好这个问题。

要取得好的社会效益，几年来的经验告诉我们，各级计划生育部门，要有全局观念。服

务全局，这是我们部门工作的出发点和归宿。到本世纪末，实现社会主义四个现代化、工农业年总产值翻两番、国民生产总值按人口平均达到八百至一千美元、人民生活达到小康水平、人口控制在十二亿左右，到二十一世纪中叶，经济发展接近发达国家的水平，这是全局。计划生育工作就要服从和服务于这个全局，紧紧围绕全党全国的总任务、总目标，制定方针政策，采取适当的措施。要适应全局的发展变化，不断改进我们的工作。如果只看到部门工作，只看到局部，忽略全局，或者只看到眼前利益，而忽略长远利益，就不会有好的社会效益。

制定人口控制方案，要有利于调整好人口年龄结构，既不要使人口的年轻型结构延续太长，也不能让老年型来得太快太急。既要考虑到本世纪末的需要，又要有利于下一世纪五十年代的要求。不仅看到今天，还要看到明天。这才有好的社会效益。

要取得好的社会效益，就要精心指导全部计划生育工作。在我们工作中，要经常注意三句话的两个方面，不能片面。如果只注意人口指标，不注意群众的反映，就不能说收到了好的社会效益；如果不注意做群众工作，放任自流，以致人口失控，也不能说收到了好的社会效益。在工作中，要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一切从实际出发。制定政策，采取措施，都要实行区别对待，分类指导。要坚持群众路线，善于动员群众，团结群众，做好计划生育。要注意使群众掌握节育技术和使用避孕药具的知识，精心指导群众避孕，使群众有安全感。总之，只有把思想工作、人口规划、政策措施、工作作风、工作方法、药具服务等方面都搞得很好，才能达到计划生育工作预期的目的，才会有好的社会效益。

第三，我国实行计划生育的基本原则是实行国家 指导同群众自愿相结合

我国的计划生育是同社会主义生产方式相联系的，是为了国家的富强，民族的繁荣，家庭的幸福，因而可以在全社会范围内实行。我们国家的各项工作都是在党和政府领导下，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下进行的。计划生育没有国家的指导不行。国家指导就是根据四项基本原则，根据社会主义建设的总任务、总目标，制定法规、条例，制定人口发展战略和规划，制定计划生育工作方针政策，确定工作重点和方法，提供宣传和技术服务，组织各有关部门通力合作，建立计划生育工作网的管理体制，等等。国家指导的目的，是从思想、法律、政策、组织、技术等方面给予有力的支持和保证，动员和组织群众，引导群众认识计划生育的意义和懂得如何实行计划生育，使计划生育工作健康发展。

计划生育关系到群众的利益，没有群众的支持，没有群众自觉自愿的行动不行。各级计划生育干部在工作中要坚持相信群众，依靠群众，关心群众安危，全心全意为群众服务。一切言行要有利于群众觉悟的提高，知识的增进，有利于群众的身心健康，家庭幸福，使群众坚定地团结在党的周围，自觉实行计划生育。

第四，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是我们计划 生育工作的基本内容

我们建设四化，振兴经济，既要抓物质文明建设，又要同时抓好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

设。这次党的全国代表会议又着重强调了加强思想教育问题，最重要的就是要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教育。这个问题我们过去做了一些工作。但是我们的认识不够，强调不够，指导也不够有力。“七五”期间要在计划生育工作的全过程和每个环节，切实把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当作大事来抓。计划生育工作的着眼点不仅仅是考虑到某个人口计划指标，而且还要使亿万群众在实践中摆脱旧思想的影响，移风易俗，转变生育观。群众生育观的转变，是一个长期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过程。这就要求我们坚持不懈地把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抓紧抓好。

在计划生育工作中，加强精神文明建设，必须强调干部和党员的模范作用。要教育干部和党员振奋革命精神，有理想，有纪律，带头执行有关政策，不开“歪口子”；要坚持文明作风办文明事，不损害国家利益和人民利益；要引导带动下级干部和群众一起自觉实行计划生育。实践证明，哪里的干部和党员这样做了，那里的计划生育工作就能顺利开展。

在精神文明建设中，要联系实际，创造性地，扎扎实实地在群众中进行“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教育。在计划生育的实践中涌现了大批的先进集体和先进个人，他们的先进事迹，是十分感人的。许多人把远大理想同当前社会主义建设结合起来，个人利益服从国家利益，响应党的号召，体谅国家困难，带头实行计划生育。他们决不因个人的一时失误而损害他人、多数人和后代人的幸福。他们还积极学习科学技术知识，按科学方法实行计划生育。他们严格遵守纪律，按计划生育政策办事，团结在党的周围，按党的要求行动。他们的先进事迹，闪耀着共产主义思想的光辉。实践证明，用共产主义思想武装干部和群众，计划生育工作才能顺利进行。我们各级计划生育领导机关，要加强对精神文明建设的领导，要善于发现和发挥群众中蕴藏的巨大的社会主义积极性和创造性，总结他们的经验，表扬他们的先进思想，使“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高尚风气在群众中发扬光大。精心引导群众，用大道理引导，用科学知识引导，用先进典型引导，逐步提高群众觉悟，使群众懂得为什么实行计划生育和如何实行计划生育，使实行计划生育成为自觉的行动。

进行思想教育，搞好精神文明建设，要从实际出发，做好经常性工作，有针对性地进行，要讲效果。我们决不能简单、片面、武断。不能搞运动，一阵风。不能做表面文章。

我国计划生育工作中这些显著之点还在探索中，还不完备，还较粗糙。但是“六五”期间的实践已经证明，以上各点一经被干部群众所掌握，就能真正发挥出我们的优势，指导我们的工作迅速前进。“七五”期间我们还要进一步探索，进一步总结，使之更加条理化，使具有中国特色的计划生育道路，更加明确，更加完整。

为了把“七五”期间计划生育工作做好，为了更好地探索具有中国特色的计划生育道路，必须抓好干部的理论学习。计划生育工作是一项新的工作，我们还缺少经验，更没有系统的理论。什么是社会主义国家的计划生育，马、恩、列、斯是怎样论述的，我们党的领导同志是怎样论述的，我们还没有理论联系实际地掌握起来。基本理论和方法准备不足，在实际工作中，必然带来盲目性，这是我们队伍中的一个大问题。各级计划生育干部，要在加强各项管理知识学习的同时，加强理论学习，提高理论水平。各级计划生育部门都要养成学理论、议大事的兴趣。各级干部都要虚心向人口科学工作者学习，同人口科学工作者结合起来，研究解决新形势下的新问题。只有这样，才能坚持正确的方向，才能从实际出发，解决新形势下的新问题，才能科学地预见未来。我们相信，如果把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和基本方

法，包括我们党中央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实际相结合，对人口和计划生育工作所作的论述，学习好，掌握好，我们的工作会出现新的飞跃。

祝会议成功。

我国国民经济的发展与计划生育*

许 涤 新

(一)

我国国民经济在“六五”期间取得了可喜的成就，这种成就表现在我国的农业、轻工业、重工业之间的比例关系，积累和消费之间的比例关系，比较协调地在发展着。农业生产从缓慢发展走向全面高涨；轻工业生产，从远远不能满足人民需要，走向日益繁荣；能源生产从停滞不前转为持续增长。在整个“六五”期间，全国工农业总产值年平均增长速度，很可能达到10%；将在明年开始的“七五”计划，工农业总产值年平均增长率可能达7%左右，国民生产总值年平均增长率可能超过7%。现在的情况同五年前的1980年相比，已经大不相同了。在1980年底，我们的任务是进一步调整国民经济，是解决比例严重失调的问题，是解决人民群众的温饱问题。现在，我国人民的温饱问题，基本已经得到解决。今后的任务是由温饱型逐步转向小康型，使我国人民在本世纪末达到小康的生活水平。这个历史任务当然需要我们做出巨大努力才能实现，但是，实现这个历史任务的条件和可能性则是明显地存在着的。

从整体来看，做好计划生育工作以控制人口增长，是实现这个从温饱型到小康型的历史任务的重要侧面之一。我国的计划生育工作从七十年代初期以来是逐步取得成就的。最近几年，全国的自然增长率的情况是这样：1971年是23.33‰；1977年是12.00‰；1979年是11.6‰；1982年是14.49‰；1984年是10.81‰。这种趋势证明我国人口自然增长率是逐步在下降。我国计划生育的要求在原则上除提倡晚婚外，是提倡一对夫妇生一个孩子。上述的自然增长率的逐步下降，就是这一要求的表现。但是，这种表现是经过艰苦的宣传教育而逐步取得的。根据“千分之一生育率抽样调查”，1981年在全国已婚育龄妇女中，有一个子女的占19.1%；有两个子女的占21.4%；有三个子女的占49.5%，而还没有子女的占9.9%。从这些数字来看：有一个子女的在全国已婚育龄妇女中，达不到20%；而有三个子女的却将近50%。如果把有三个子女和有二个子女的已婚育龄妇女加在一起，则她们在全国已婚育龄妇女中，竟超过70%。从妇女生育的胎次比例来看，1983年一胎为65.90%，二胎为22.40%，多胎为11.70%。一胎率上升，多胎率下降，是近年来明显的趋势；而且城乡有区别，汉族与少数民族有区别。这就证明：在我国二胎、多胎现象还是明显地存在着；这也在证明一对夫妇只生育一个子女的原则，并不是不顾具体情况而硬性地执行的；这也在证明：我国的计划生育

*本文为中国人口学会会长许涤新同志，在第四次全国人口科学讨论会上的讲话。

工作，还有必要在做好宣传教育、改善医药的条件下，进一步加以推广。

我国的计划生育工作，同国民经济的发展，是密切相关的。由于工农业生产的发展，城乡人民的生活水平显著地有所提高。“六五”期间，人民的温饱还是一个极其突出的问题，由于国民经济的发展，这个问题已经基本得到了解决。五年来，新就业的城镇劳动力达三千多万人；扣除物价上涨因素，全国职工工资总额增加达50%左右，平均工资增加20%以上；农民平均纯收入增加80%。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出，城乡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是以工农业生产的发展作为前提的，而计划生育对于改善城乡居民的生活水平，也起了一定的作用。根据1953—1978年的经验，每年新增加的消费额中，58%左右被新增的人口所消费掉，而用于提高原有居民消费额部分，只占42%。控制人口的增长，成为提高城乡原有居民消费额部分的一个不可忽视的条件。这一点，在最近五年间已经显得更加明确了。

但是，这并不是说，中国的人口问题，已经从根本上得到解决，因为人口的自然增长同生活资料的增长比较，还是相当高的；劳动适龄人口的增长，同生产资料的增长，亦不相适应；“七五”期间，进入婚育年龄的人口处于高峰，人口的增长（每年大体还要净增一千多万人）同教育、住宅、卫生、交通等公共事业的发展，也不相适应。这种情况，要求我们在发展我国国民经济的同时，要继续做好计划生育工作。

我国农村居住着八亿人口，因而推行计划生育的重点在农村。由于农业生产比城市更早地实行联产责任制，农民的收入和生活水平，连年在增长、在提高。在这个过程中，农民逐渐认识到致富的道路，要靠科学技术，要善于经营管理，但是也有不少农民为了增加收入，还是希望增加劳动力。就是说，还是希望多生儿子。由此可见，生产责任制为农村经济带来了活跃，同时也为计划生育工作带来了困难。我们必须进一步做好宣传教育和医疗卫生等方面的工作，以便突破这个困难。

（二）

事实在证明我国在建设社会主义的过程中，是把物质财富的生产同人口本身的生产，结合起来考虑的。这种做法是符合于马克思主义的。

恩格斯明确地指出：“根据唯物主义观点，历史中的决定因素，归根到底是直接生活的生产和再生产。但是，生产本身又有两种。一方面是生活资料即食物、衣服、住房以及为此必需的工具的生产；另一方面是人类自身的生产，即种的繁衍。一定历史时代和一定地区内的人们生活于其下的社会制度，受着两种生产的制约：一方面受劳动的发展阶段的制约，另一方面受家庭的发展的制约。”^①恩格斯这一段话的基本意思，就是指人与自然“两种关系”的统一，就是指物质生产和人们自身生产的统一。事情很明白，物质资料的生产是不可能同人类自身的生产相互隔绝的。如果不重视人的生产问题，那么，谁去从事物质资料的生产和再生产呢？物质资料的生产和再生产又是为谁呢？历史的事实证明，物质资料生产的主体和前提，是离不开人的。如果离开了人类的再生产，那是不可思议的。马克思说道：“社会生产过程既是人类生活的物质生存条件的生产过程，又是在历史上经济上独特的生产关系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2页。

中进行的过程，是生产、再生产着这些生产关系本身，因而生产和再生产这个过程的承担者，他们的物质存在条件和他们的相互关系即他们一定的社会经济形式的过程。”^①马克思这一段话的主要意思正是在说，社会的物质资料的生产和再生产过程，也在生产和再生产着承担这种过程的人们。由此可见，物质的生产和再生产过程同人的生产和再生产过程，并不是绝缘的，而是有着密切关系的。

当然，物质生产同人的生产是有区别的。生产物质财富的生产过程是因生产方式之不同而有所差别的。人的生产和再生产，则是以家庭为单位，在这里，家庭是受着一定的生产方式所规定的。在资本主义社会里，生产方式以生产资料的资本家所有制为基础，在这里，资本家的家庭同雇佣劳动者的家庭，显然是矛盾的，而这种矛盾是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产生的。在社会主义社会里，生产方式是以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公有制为基础的，在这里，工人家庭、农民家庭和知识分子家庭之间并不存在着阶级矛盾，这也是受着社会主义生产方式所规定的。恩格斯指出的两种生产中，以家庭作为单位的人的生产，是受到物质生产的生产方式所制约的。因而，他在提出社会的物质生产的决定性之后，提出人类本身的生产的作用，我认为并不动摇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理论。

在社会主义制度下，社会的发展，表现在物质财富的生产日益增长。对人类来说，物质财富，越能满足人民生活的各种需要。而人的生产则不是这样。人口的增长，如果增加的太快太多，对于社会生产和人类本身，都会带来压力。都会增加对于食物、衣服、住房、医疗、上学以及就业等等的需要和要求。如果物质生产不能满足这些需要和要求，那就没法不引起社会的紧张。因此，人口的增长必须同物质生产的增长相互适应。也就是说，在一定情况下，必须为人口的增长规定一个限度。恩格斯在1881年曾提到对人口增长规定一个限度的可能性。他说道：“人类数量增多到必须为其增长规定一个限度的这种抽象可能性，当然是存在的。但是，如果说共产主义社会在将来某个时候不得不象已经对新的生产进行调整那样，同时也对人的生产进行调整，那么，正是那个社会，而且只有那个社会才能毫无困难地作到这点”。因此，一方面要大力发展物质生产；一方面要控制人口的增长，这就是要自觉地使人口的增长适应于物质生产的发展，只有在社会主义国家里才能实现恩格斯所指的为人口的增长，规定一个限度，历史已经证明，在资本主义社会里，特别是在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里，物质生产是在无政府状态中进行的，人口的生产和再生产也是在无政府状态中进行的。两种生产，既然都在无政府状态中进行，当然谈不到自觉地使人口的增长同物质生产相适应。自觉地使人口的增长适应于物质生产的发展，这是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之一。当然，要使群众认识控制人口的必要性和社会主义制度的这一优越性，是需要我们去做艰苦的工作的。

(三)

最近美国一些人，宣扬自由经济发展了，人口自然会下降，没有必要去“限制生育”，甚至把资本主义制度说成是限制人口增长的根本保证，而把我国人口增长较快的原因，归罪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第925页。

于社会主义制度。他们公然提出我们要改变社会制度，实行什么“自由经济”，才能解决人口问题。

美国这些人的这种说法，在政治上是干涉我国内政、破坏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狂妄行为。我国自1971年以来就大力推行计划生育的政策，这一政策是受到我国多数人民所接受的。由于这种政策的实行，从七十年代初期到现在，估计我国少生几千万人口。这个数字相当于西欧一个大国的人口。这个数字在世界人口问题达到爆炸程度的今日，中国实行计划生育的成就，对于减少世界人口问题的严重性，是有贡献的。但是，美国某些人士不但不承认中国对于解决世界人口问题的贡献，反而干涉我国内政，企图改变我国社会制度。这是中国人民所不能容忍的。

难道资本主义经济发展了，人口就自然下降吗？一般说来，生产力发达的第一和第二世界国家，人口的自然增长率比较低（但是，必须考虑到这些国家的打胎现象的严重）。尽管人口自然增长率比较低，尽管它们的经济相当发达，尽管它们的人口绝对数增长并不快，但是，它们的相对过剩人口还是突出地存在着，而且是大量地存在着。在周期性经济危机来临的时候，那就更加严重。试问这些失业的劳动者在资本主义经济的危机中，有什么办法解决其工作和生活的问题呢？马克思早在一百年前就指出：“马尔萨斯愚蠢地把一定数量的人同一定数量的生活资料硬联系在一起。李嘉图当即正确地反驳他说，假如一个工人没有工作，现有的谷物数量就同他毫不相干，因而，决定是否把工人列入过剩人口范畴的是雇佣资料，而不是生活资料。”^①几百年的事实证明：资本主义制度对于人口问题不但无能为力，而且成为产生过剩人口的基本原因。三十年代的大危机已成过去，但是，西方国家还是谈虎变色的。在1982年深深地陷入经济危机的美国，失业人数达到1,200万人，如果加上西方其他国家，失业人数突破3,200万人。这一支庞大的失业大军难道不是资本主义制度产生出来的过剩人口么？甚至在经济进入景气时期，美国的过剩人口，还显然存在着。据《时代》周刊（1985年2月4日出版的那一期）所载，美国今年的严重春寒，使全国有200万以上无家可归的人露宿在街头，冻死在街头。资本主义制度如果是限制人口增长的根本保证，那么，这么多的过剩人口意味着什么呢？1985年2月的严重春寒，全国无家可归的人，达到200万。这又在意味着什么呢？铁一般的事实证明，资本主义制度正是产生大量过剩人口的基本原因。美国一些人的那种说法，难道不是在自欺欺人吗？

我国的计划生育工作，是取得了初步成就的。当然，我们不应忽视在工作过程中出现的缺点和失误。当前在城乡经济体制改革中，我们必须总结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教训，必须做好调查研究，结合实际情况进行人口科学研究，为因时因地，实现我们的计划生育工作，作出应有的努力。

（1985年10月10日）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下第108页。

国际人口学会(佛罗伦萨)对我国1982年人口普查结果的评价和提出的问题

国家统计局 李成瑞

国际人口科学研究联合会 (International Union for the Scientific Study of Population) 于1985年6月5日—12日,在意大利的文化古城佛罗伦萨召开了国际人口会议。到会各国人口学家一千余人,除大会外,举行了28个专题讨论会。会议主持人鉴于中国1982年举行的十亿人口的普查具有重大国际意义,特设“中国1982年人口普查”专题讨论会议,事先委托中国人民大学人口理论研究所所长刘铮教授为组织者,约请中国和外国人口学家提出论文,于会前印发。其中两篇特邀论文,即:李成瑞的《中国1982年人口普查资料的可靠性》、邬沧萍的《从中国人口普查的年龄结构分析中国人口的转变》,两篇提交论文,即班尼斯特(美国)的《对中国1982年人口普查结果的惊奇与确认》、G·卡洛(法国)的《为便于分析中国人口资料的几点建议》(另有几篇论文,临时在会上散发)。该专题会议由大会主席康赛普馨女士亲自主持,到会约三百人,是人数最多的专题会议之一。我国参加这次大会的13位同志全部参加了这次专题讨论会。会上首先由刘铮教授概述专题论文组织经过及四篇论文的主要内容,然后由评论员游允中(联合国人口司)发表评论,班尼斯特(班久蒂)及卡洛作了发言,接着展开热烈的自由的讨论,李成瑞、邬沧萍对所提问题作了答复。最后,由康赛普馨女士作了总结。会后,有些人向刘铮同志祝贺会议成功,许多人反映,这个会议,是会议最成功的专题会议之一。现将国外学者对中国1982年人口普查和生育率抽样调查的总评价、对中国历年人口资料提出的问题概述如下,最后对国内人口学的研究提出几点建议,供作参考。

一、国外学者对我国1982年人口普查和生育率 抽样调查的总评价

法国国立人口研究所所长G·卡洛在《为便于分析中国人口资料的几点建议》一文中写道:“1982年至1984年是世界人口学史上值得纪念的年代。在这三年中,中国这个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第一次向世界人口学界提供了自1950年以来这个国家人口演变的真实和大量的统计数据。由此,使我们对整个世界人口的认识得到了一个相当可观的飞跃。”“我们完全同意研究中国人口资料的同行们所作的几乎一致的评价,即认为这些资料基本上是相当严密协调

的。”

美国普查局中国科科长班尼斯特在《对中国人口普查结果的惊奇与确认》一文中写道：“对1953年、1964年和1982年人口普查中年龄和性别数据的分析得出了这一令人吃惊的结论，即：三次普查中年龄申报的质量非常高。”“另一点令人惊奇的是：不顾地方上低报出生人数的强大政治压力，这次人口普查和生育率调查，竟能相对完整地对出生人数进行了登记。”“这次人口普查的总数证实了来自经常性登记系统的中国人口数字。”“最后，在中国对城市人口规模进行多年低估以后，这次普查透露出1982年有21%的人口居住在城镇，比1981年底发表的14%的城市人口更加接近实际。”她还写道：“这次普查用高质量的、大量的人口方面的统计数字，代替了以前值得怀疑或不能使用的数据，或在某些方面根本没有数据的那种局面。”“本文作者得出下列结论，即：中国进行1982年人口普查所花费的巨大努力与其所得到的丰富的人口知识相比，是值得的。”

美国人口学家、普林斯顿大学教授科尔在会前发表的《中国人口的急剧变化（1952—1982）》一文中写道：“中华人民共和国于1982年进行了一次人口普查。……1982年中国还进行了一项涉及大量家庭户的生育率抽样调查（总人口超过一百万）……新近还公布了根据1953年和1964年人口普查列出的按性别和逐个年龄的人口分布数字。……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从其建国以来在生育率、死亡率以及婚姻状况发生的显著变化建立一部精确而详尽的历史，打下了牢固基础。”又写道：“将这些数据（按：指1%生育率调查）与1953年、1964年和1982年人口普查的数据，按性别及逐个年龄人数结合比较，它们经受住了一系列精度与一致性的严格考验。”“确实，现在中国人口情报资料的精度和细度，已超过我们目前所知道的世界上一切发展中国家。”

美国人口学家罗纳尔德·弗里德曼在会前发表的《1982年中国人口普查的组织、质量控制以及准确性》一文中写道：“由于普查前进行了全面培训、试点调查，普查期间的监督、质量控制和检查，以及普查的检查和抽样，差错低是可信的。实际上，上述工作的广度和深度，在历史上是独一无二的。差错率是否真的象估计的那样低，则是将来人们要讨论的事。”

“由于令人信服的检查系统和交叉检查资料，看来不会隐藏着大的误差。中国人口迁移较少，又有很强的行政管理——政治控制系统和登记系统的资料来源。所有这一切，使人口普查的可靠性增强。即使实际差错率比报告的差错率大十倍（按：报告的差错率为0.15%，其十倍为0.15%），中国人口普查仍然是一项令人瞩目的成就。”“可以肯定地说，中国1982年人口普查对于中国进行社会计划和人口统计分析来说，将是一项无法估价的资源。”

这次会议代表对我国1982年人口普查的评价，具有以下特点：

（1）总的评价是很高的，同时又是很有分寸的（为他们提出问题留有充分余地）。

（2）达到这次评价是经过一个过程的。1982年10月我们公布手工汇总数字时一般未做评价，有些人认为或怀疑这次普查是照抄了户口本，1983年底电子计算机处理的10%资料公布后。在1984年3月北京的国际讨论会上，一部分人提出了初步的评价，当时主要是称赞我国普查的规模大、计算机处理速度快，一部分学者认为普查数字质量是高的，但当时还没有来得及对资料作仔细的研究。这次会议上的评价则是经过一年多的认真研究后得出的结论。

（3）他们的评价主要是根据人口学理论运用数学方法和电子计算机。对我国公布的各种数据的一致性，进行了一系列严格检验。其中包括：1982年人口普查数据内部一致性；这次普查数据与1953年、1964年普查数据的一致性；与历年人口统计数据的一致性；与1%生